



周詩新詮

任乃強 著

總編纂 舒大剛

《巴蜀全書》編纂領導小組 組織

巴蜀書社



巴蜀文化研究大家系列

◎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編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項目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巴蜀全書》（10@zh005）

四川省重大文化工程《巴蜀全書》（川宣〔2012〕110號）

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重點科研項目

周詩新詮

任乃強 著

巴蜀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周詩新詮 / 任乃強著. — 成都: 巴蜀書社, 2015.12

ISBN 978-7-5531-0521-5

I. ①周… II. ①任… III. ①《詩經》—詩歌研究

IV. ①I207.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5) 第 068865 號

周詩新詮

任乃強 著

責任編輯 劉 冰

出 版 巴蜀書社

成都市槐樹街2號 郵編 610031

總編室電話: (028)86259397

網 址 www.bsbook.com

發 行 巴蜀書社

發行科電話: (028)86259422 86259423

經 銷 新華書店

印 刷 成都翔川印務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187mm×267mm

印 張 40.75

字 數 1000 仟

書 號 ISBN 978-7-5531-0521-5

定 價 200.00 圓

ISBN 978-7-5531-0521-5



本書若有印裝質量問題, 請與工廠調換。

巴蜀文化研究大家系列

編輯委員會

主任

侯水平

副主任

李明泉 羅 鳴 萬本根 李 慶

學術總務

譚繼和

《巴蜀全書》出版說明

《巴蜀全書》是收錄和整理巴蜀歷史文獻的大型叢書。該項工作二〇一〇年一月經由中共四川省委常委會議批准為四川省重大文化工程；同年四月又獲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批准，列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託項目。該計劃將對現今四川省、重慶市及其周邊亦屬傳統“巴蜀文化”區域內的各類古典文獻進行系統調查、整理和研究，實現對巴蜀文獻有史以來規模最大、體例最善、編纂最科學、使用最方便的著錄和出版。

《巴蜀全書》編纂工程，將收集和整理自周秦以下乃至民國初年歷代巴蜀學人撰著的重要典籍以及其他作者撰著的反映巴蜀歷史文化的作品，編纂彙集成巴蜀文獻的大型叢書。主體工作將分“巴蜀文獻聯合目錄”“巴蜀文獻精品集萃”“巴蜀文獻珍本善本”三大類型，計劃對兩千餘種巴蜀文獻編製聯合目錄和內容提要，對五百餘部、二十餘萬篇巴蜀文獻進行精心校點或注釋、評析，對一百餘種巴蜀善本、珍本文獻進行考察和重版。

通過編纂《巴蜀全書》，希望打造出巴蜀文化的“四庫全書”，為保存和傳播巴蜀歷代的學術文化成果，促進當代“蜀學”振興與巴蜀文化建設，奠定堅實的文獻基礎；為提升中華民族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建設文化強國貢獻力量。

《巴蜀全書》編纂領導小組

整理巴蜀文獻 傳承優秀文化

——《巴蜀全書》前言

舒大剛 萬本根

中華民族，多元一體；中國文化，羣星璀璨。在祖國大西南，自古就傳承着一脈具有深厚歷史底蘊和鮮明個性的文化，即巴蜀文化。巴蜀地區，山川秀麗，物產豐富，自古號稱“陸海”“天府”；巴蜀文化，源遠流長，內涵豐富，是古代長江文明的源頭，與“齊魯文化”“荊楚文化”“吳越文化”等同為中華文化之瑰寶。整理和研究巴蜀文化的載體——巴蜀文獻，因而成為研究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不可或缺的內容。

一、綜覽巴蜀文化 增強自信熱力

巴蜀地區氣候宜人，資源豐富，是人類早期的發祥地之一。考古發現，這裏有距今二百零四萬年的“巫山人”，有距今三萬五千年的“資陽人”。這裏不僅有大禹治水、巴族廩君、蜀國五主（即蠶叢、柏灌、魚鳧、杜宇、開明五個王朝）等優美動人的歷史傳說，也有寶墩文化諸古城遺址、三峽考古遺址、三星堆遺址、金沙遺址、小田溪遺址、李家壩遺址等重大考古發現。商末周初，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以及勇銳的巴師，曾參與武王伐紂。春秋戰國，巴濮楚鄧、秦蜀苴羌，雖互有戰伐，亦相互交流。秦漢以降，巴蜀的地利和物產，更是抵禦強辱、周濟天下、維護祖國統一、實現持久繁榮的戰略屏障和天然府庫。

在祖國“多元一統”的文化格局中，巴蜀以其豐富的自然和人文資源，哺育出一批又一批傑出人物和文化精英，既有司馬相如、王褒、嚴遵、揚雄、常璩、陳壽、陳子昂、趙蕤、李白、蘇軾、張栻、魏了翁、李心傳、虞集、楊慎、唐甄、李調元、楊銳、劉光第、廖平、宋育仁、謝無量、郭沫若、巴金等文化巨擘，也有朱之洪、張瀾、謝持、張培爵、吳玉章、楊庶堪、黃復生、尹昌衡、鄒容、熊克武、朱德、劉伯承、聶榮臻、陳毅、趙世炎、鄧小平等革命英傑，他們超拔倫輩，卓然振起，敢為天下先，樂為蒼生謀，創造了輝煌燦爛的思想文化，也推動了中國社會的歷史巨變，演繹了一

幕幕驚心動魄的歷史大劇。

歷代巴蜀學人在祖國文化的締造中，成就巨大，表現突出，許多文化人物和文明成果往往具有先導價值。巴蜀兒女銳意進取的創新精神，使這種創造發明常常居於全國領先地位，成為祖國文化寶庫中耀眼的明珠。

在傳統思想、文化和宗教領域，中國素號“三教互補”，“儒”“釋”“道”交互構成中華思想文化的主要內容，而儒學是其主幹。從漢代開始，巴蜀地區的儒學就十分發達，西漢蜀守文翁在成都創建當時全國首個郡國學校——石室學宮，推行“七經”教育，實行儒家教化，遂使蜀地民風丕變，並化及巴、漢，促成中國儒學重要流派——“蜀學”的形成，史有“蜀學比於齊魯”之稱。巴蜀地區是“仙道”派發源地，東漢張陵在蜀中創立“天師道”，中國道教正式誕生。東漢佛教傳入中國後，四川也是其重要傳播區域。

巴蜀“易學”源遠流長，大師輩出。自漢胡安（居邛崃白鶴山，以《易》傳司馬相如）、趙賓（治《易》持論巧慧，以授孟喜）、嚴遵（隱居成都，治《易》《老》）、揚雄（著《太玄》）而下，巴蜀治《易》之家輩出。晉有范長生（著《周易蜀才注》），唐有李鼎祚（著《周易集解》），宋有蘇東坡（著《東坡易傳》）、房審權（撰《周易義海》）、魏了翁（撰《周易集義》《周易要義》）、張栻（著《南軒易說》）、李石（著《方舟易說》）、李心傳（著《丙子學易編》），元有趙采（著《周易程朱傳義折衷》）、黃澤（著《易學濫觴》）、王申子（著《周易輯說》），明有來知德（撰《周易集注》）、熊過（著《周易象旨決錄》），清有李調元（著《易古文》）、劉沅（撰《周易恒解》），皆各撰易著，發明“四聖”（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心。巴蜀易學，普及面廣，自文人雅士、方術道流，以至引車賣漿之徒、箍桶織履之輩，皆有精於易理、善於測算者。理學大師程頤兩度入蜀，得遇奇人，遂有感悟，因生“易學在蜀”之歎。

巴蜀“史學”名著迭出、斐然成章。陳壽《三國志》雅潔典要，名列“前四史”；常璩《華陽國志》體大思精，肇開方志體。譙周《古史考》，開古史考證之先聲；蘇轍《古史》，成舊史重修之名著。至於范祖禹（撰《唐鑑》，助司馬光修《通鑑》）、李燾（撰《續資治通鑑長編》）、王偁（撰《東都事略》）、李心傳（撰《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及《朝野雜記》《宋會要》），更是宋代史學之巨擘，故劉咸炘有“史學莫隆於蜀”之說。

蜀人“好文”，巴蜀自古就是歌賦詩詞的沃壤。禹娶塗山（今重慶南岸真武山，常璩《華陽國志·巴志》、酈道元《水經注·江水一》），而有“候人兮猗”的“南音”，周公、召公取之“以為《周南》《召南》”（《呂氏春秋·音初》）。西周江陽（今瀘州）人尹吉甫亦善作詩，《詩經》傳其四篇（曹學佺《蜀中廣記》卷九一）。“文宗自古出

巴蜀”，“漢賦四家”，司馬相如、揚雄、王褒居其三。陳子昂、李太白首開大唐雄健浪漫詩風，五代後蜀《花間集》與北宋東坡詞，開創宋詞婉約、豪放二派。“三蘇”（蘇洵、蘇軾、蘇轍）父子，同時輝耀於“唐宋八大家”之林；楊慎著作之富，位列明代儒林之首。“自古詩人例到蜀”，漢晉唐宋以及明清，歷代之遷客騷人，多以巴蜀為理想的避難樂土，而巴蜀的山水風物又豐富其藝情藻思，促成創作高峰的到來。杜甫、陸游均以巴蜀為第二故鄉，范成大、王士禛亦寫下千古流芳的《吳船錄》和《入蜀記》。洎乎近世，沫若、巴金，蔚為文壇宗匠；蜀謳川劇，技壓梨園羣芳。

“三蘇”父子既是文學大家，也是“蜀學”領袖；綿竹張栻，不僅傳衍南宋“蜀學”之道脈，而且創立“湖湘學派”之新範。明末唐甄撰《潛書》，斥責專制君主，提倡民本思想，被章太炎譽為“上繼孟、荀、陽明，下啟戴震”的一代名著。晚清廖平撰書數百種，區分今學古學，倡言託古改制。錢基博、范文瀾俱譽其為近代思想解放之先驅。新都吳虞，批判傳統道德，筆鋒犀利，被胡適譽為“思想界的清道夫”。

在科技領域，秦蜀守李冰開建的都江堰，是至今還在使用的人類最古老的水利工程；漢代臨邛人民，開創了人類歷史上最早使用天然氣煮鹽的記錄。漢武帝徵閬中洛下閎修《太初曆》，精確計算回歸年與朔望月，是世界上首部“陰陽合曆”的範本。楊子建《十產論》異胎轉位術領先歐洲五百年。北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將本草學與方劑學相結合，是世界上第一部大型藥典和植物志。王灼《糖霜譜》詳錄蔗糖製作工藝，是有關製糖技術的首部專書。南宋秦九韶《數學九章》，將中國數學推向古代科學頂峰，其“大衍求一術”領先西方世界同類算法五百年。

至於巴蜀地區的鄉村建設和家族文化，也是碩果累累，佳話多多。他們或夫婦齊名、比翼雙飛（司馬相如與卓文君，楊慎與黃娥）；或兄弟連袂，花萼齊芳（蘇軾、蘇轍，蘇舜欽、蘇舜元，李心傳、李道傳、李性傳等）。更有父子祖孫，世代書香，奕世載美，五世其昌：閬中陳省華及其子堯佐、堯叟、堯咨等，“一門二相，四世六公，昆季雙魁多士，仲伯繼率百僚”（霍松林語）；眉山蘇洵、蘇軾、蘇轍及子孫輩過、籀，並善撰文，號稱“五蘇”；梓州蘇易簡及其孫舜欽、舜元，俱善詩文，號稱“銅山三蘇”；井研李舜臣及其子心傳、道傳、性傳，俱善史法、道學，號稱“四李”；丹稜李燾與其子壁、塏，俱善史學、文學，時人贊“前有三蘇，後有三李”。降及近世，雙流劉沅及其孫咸榮、咸炘、咸煥，長於經學、道學與史學，號稱“槐軒學派”。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綜觀巴蜀學術文化，真可謂文章大雅，無奇不有！其先於天下而創者，則有導夫先路之功；其後於天下而作者，則有超邁古今之效！先天後天，不失其序；或創或繼，各得其宜。

二、整理巴蜀文獻 促進文化興邦

歷史上的四川，既是文化大省，也是文獻富省。巴蜀上古歷史文化，在甲骨文、金文和《尚書》《春秋》等華夏文獻中都有記錄，同時巴蜀大地還孕育形成了別具特色的“巴蜀文字”。秦漢統一後，歷代巴蜀學人又為我們留下了汗牛充棟、豐富多彩的古典文獻。唐代中後期（約八世紀初），成都誕生了“西川印子”，北宋初期（十世紀後期）又出現了“交子雙色印刷術”，標誌着雕版印刷的產生、成熟和創新，大大推動了包括巴蜀文獻在內的古典文獻的保存與傳播。據不完全統計，歷史上產生的巴蜀古文獻不下萬餘種，現在依然存世的也在五千種以上。

巴蜀文獻悠久綿長，影響深遠，上自先秦的陶字、金文，下迄漢晉的竹簡、石刻，以及唐刻、宋槧，明刊、清校，經史子集，三教九流，歷歷相續不絕，熠熠彪炳史冊。巴蜀文獻體裁多樣，內容豐富，舉凡政治之興替、經濟之發展、文化之繁榮、兵謀之奇正、社會之變革，以及思想學術之精微、高人韻士之風雅、地理民族之風貌、風俗習慣之奇特，都應有盡有，多彩多姿。它們是巴蜀文化的載體，也是中華文明的重要表徵。

對巴蜀文獻進行調查整理研究，一直是歷代巴蜀學人的夢想。在歷史上，許多學人曾對巴蜀文獻的整理和出版付出過熱情和心血，編纂有各類巴蜀總集、全集和叢書。《漢書·藝文志》載“‘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或許是巴蜀學人著述的首次彙集。五代的《花間集》和《蜀國文英》，無疑是輯錄成都乃至巴蜀作品的最早總集。宋代逐漸形成了“東坡七集”（蘇軾）、“樂城四集”（蘇轍）、“鶴山大全集”（魏了翁）等個人全集，以及《三蘇文粹》《成都文類》等文章總集。明代出現楊慎的個人全集《升庵全集》和四川文章總集《全蜀藝文志》。入蜀為官的曹學佺還纂有類集巴蜀歷史文化掌故而成的資料大全——《蜀中廣記》。清代，李調元輯刻以珍稀巴蜀文獻為主的《函海》，可視為第一部具體而微的“巴蜀文獻叢書”。近代編有各類“蜀詩”“蜀詞”“蜀文”和“川戲”等選集。這些都為巴蜀文獻的系統編纂、出版做出了有益嘗試。

二十世紀初，謝無量曾提出編纂《蜀藏》的設想，因社會動盪而未果。胡淦亦擬編《四川叢書》，然僅草成“擬收書目”一卷。一九八三年中共中央《關於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下達，國家成立“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和“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員會”，四川也成立了“四川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製定出《四川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一九八四——一九九〇）。可惜這個規劃並未完全實施，巴蜀文獻仍然處於分散收藏甚至流失毀損的狀態。

二〇〇七年初，國務院下發《關於進一步加強古籍保護工作的意見》，全國各省紛紛編纂地方文獻叢書。四川大學和四川省社科院的學人再度燃起整理鄉邦文獻的熱情，向四川省委、省政府提交“編纂《巴蜀全書》，振興巴蜀文化”的建議，四川省委、省政府再度將整理巴蜀文獻提到議事日程。經過多方論證研究，二〇一〇年一月四川省委常委會議批准“將四川大學申請的《巴蜀全書》納入全省古籍文獻整理規劃項目”；四月又獲得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批准，將《巴蜀全書》列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託項目”。千百年來巴蜀學人希望全面整理鄉邦文獻的夢想終於付諸實施。

《巴蜀全書》作為四川建省以來最大的文獻整理工程，將對自先秦至民國初年歷代巴蜀學人的著作或內容為巴蜀文化的文獻進行全面的調查收集和整理研究，並予以出版。本工程將採取以下三種方式進行：

一是編製《巴蜀文獻聯合目錄》。古今巴蜀學人曾經撰有大量著作，這些文獻在歷經了歷史的風風雨雨後，生滅聚散，或存或亡，若隱若現，已經面目不清了。該計劃根據“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旨趣，擬對巴蜀文獻的歷史和現狀進行全面普查和系統考證，探明巴蜀文獻的總量、存佚、傳承和收藏情況，以目錄的方式揭示巴蜀文獻的歷史和現狀。

二是編纂《巴蜀文獻精品集萃》。巴蜀文獻，汗牛充棟，它們是研究和考述巴蜀歷史文化的重要資料。對這些文獻，我們將採取三種方式處理：首先，建立“巴蜀全書網”，利用計算機和網絡技術對現存巴蜀文獻進行掃描和初步加工，建立“巴蜀文獻全文資料庫”，向讀者和研究者提供盡可能集中的巴蜀文化資料。其次，本着“去粗取精，古為今用”的宗旨，按照歷史價值、學術價值、文化價值“三結合”的原則，遵循時間性、代表性、地域性、獨特性“四統一”的標準，從浩繁的巴蜀古籍文獻中認真遴選五百餘種精品文獻，特別是要將那些在中華傳統文化體系中具有首創性和獨特性的巴蜀古籍文獻彙集起來，進行校勘、標點或注釋、疏證，挖掘其中的思想內涵和治蜀經驗，為當代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建設服務。第三，根據巴蜀文化的歷史實際，收集各類著述和散見文獻，編成儒學、佛學、道教、民族、地理、文學、藝術、科技、碑刻等專集。

三是重版《巴蜀文獻珍本善本》。成都是印刷術發祥地，巴蜀地區自古以來的刻書、藏書事業都很發達，曾產生和收藏過數量眾多的珍本、善本，“蜀版”書歷來是文獻家收藏的珍品。這些文獻既是見證古代出版業、圖書館業發展的實物，也是進行文獻校讎的珍貴版本，亟待開發，也需要保護。本計劃將結合傳統修復技藝和現代印刷技術，對百餘種巴蜀文獻珍稀版本進行修復、考證和整理，以古色古香的方式予以重印。

通過以上三個系列的研究，庶幾使巴蜀文獻的歷史得到彰顯，內涵得到探究，精華得到凸顯，善本得到流通，從多個角度實現對巴蜀文獻的當代整理與再版。

盛世修書，傳承文明；蜀學復興，文獻先行。“《巴蜀全書》作為川版的‘四庫全書’，蘊含着歷代巴蜀先民共同的情感體驗和智慧結晶，昭示着今天四川各族人民共有的文化源流和精神家園。”（《巴蜀全書》編纂領導小組會議文件。下同）《巴蜀全書》領導小組要求，“我們一定要從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打牢四川人民團結奮鬥共同思想基礎的高度，來深刻認識《巴蜀全書》編纂出版工作的重大意義。特別要看到，這不是一件簡單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而是一件幾百年來巴蜀學人一直想做而沒有條件做成的文化盛事，是四川文化傳承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無論是中國古代的文化發展，還是世界近世的文明演進，都一再證明：任何一次大的文化復興活動，都是以歷史文獻的系統收集整理為基礎和先導的。我們希望通過對巴蜀文獻的整理出版，給巴蜀文化的全面研究和當代復興帶來契機，為“發掘和保護我國豐厚的歷史文化遺產，提升我國文化軟實力，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走向世界”做一些基礎性工作。

有鑒於此，《巴蜀全書》領導小組明確要求，要廣泛邀請省內外專家學者參與編纂，共襄盛舉。這一決策，實乃提高《巴蜀全書》學術水準和編纂質量的根本保障。領導小組還希望從事此項工作的學人，立足編纂，志在創新，從文獻整理拾級而上，自編纂而研究，自研究而弘揚，自弘揚而創新，“利用編纂出版《巴蜀全書》這個載體，進一步健全研究巴蜀傳統文化的學術體系，以編促學、以纂代訓，大力培養一批精通蜀學的科研帶頭人和學術新人”。可謂期望殷切，任務艱巨，躬逢其盛，能不振起？非曰能之，唯願學焉。《巴蜀全書》的編纂希望為巴蜀的文化建設和“蜀學”的現代復蘇擁簪前趨，至於搭建橋梁，開闢荆榛，上繼前賢，下啟來學，固非區區之所能，在此僅樹其高標，以俟高明云爾！

二〇一四年五月

整理說明

《詩經》是我國一部重要文獻典籍，內容涉及到先秦的社會、歷史、民俗、禮制、民族、地理、生物、語言、文學、藝術等諸多方面。兩千多年來，《詩經》研究的著述雖然汗牛充棟，成果豐贍，但大多數均從經學、文學等專業角度進行研究，甚少有跨學科的綜合比較研究。尤其是關於上古民俗、風物、地理、社會生活等方面，歷代經學家、文學家們往往不免受專業知識的局限，較少深入研究，以致不少謬訛與臆斷因襲流傳。顯然，對於《經詩》這樣一幅包羅萬象的歷史畫卷來說，不但需要有各學科專家的專門研究，更需要有跨學科的“雜家”作綜合比較研究，方能求真去訛，有所深入。

先父任乃強教授博學多聞，不僅以歷史地理與民族研究著名，而且在農業經濟、民俗文化、文學戲劇等方面也多有成就。他早年即喜愛《詩經》，在他的《回憶錄》中曾寫道：“我小時候進私塾，背讀《詩經》，先生從未曾講解過。但我七八歲時，却曾引用過它來表達我的情感：有一年新正，哥哥帶我同一對新婚夫婦到五十里外的外婆家去拜年，路過石碑樓，在路店旁一棵大杏樹下喝水，歇息了一會兒，又興奮地向前走。在外婆家玩了半個多月，一伙人告別回家，我心頭很覺難舍，兩腿沉重的跟着他們離開。再過這棵杏樹下，望見滿樹開繁了的杏花，大人們都在稱贊花好，我却不自覺的念出了‘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這幾句詩來（《小雅·采薇》）。後面的‘我心傷悲，莫知我哀’兩句，便未出口了。當時無人理我。今雖已隔六十多年了，那時的風物和情感都仍未忘掉。雖然那時並未看見楊柳和雨雪，更不懂得依依和霏霏的含義，但只覺得那幾句詩能够代表我的心情。後來每想到此事，便感慨詩歌的魔力之大，它能使不了解詩義的人也將思想感情與它契合起來！從而經常想到，拿點時間去研習《詩經》，應是很有趣的事。”

1929年後，他多次深入到西南民族地區考察，發現藏彝等民族的社會發展階段頗類殷周，其民俗中保存有不少古風，許多歌謠極似《詩經》中的篇章，堪為“禮失而

求諸於野”之實証。於是在他 1932 年出版的《西康圖經》一書中，曾以專章對此作了簡要的比較研究。1946 年，他在四川大學開設“中國農業史”課程，編寫講義時，對《詩經》中描述的先民生產、生活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發現歷代經學研究中有不少缺憾與謬誤，遂萌發對《詩》三百篇作一“新詮”的想法。怎奈自 1952 年起迭遭批判，後又被戴上“右派”帽子“監督改造”，一直無機會動筆。直至 1966 年初被“處理回家”後，才開始寫《周詩新詮》。然而不久“文革”爆發，被抓回校批鬥，文稿亦被抄去。1969 年，他被“疏散回鄉”，栖身南充縣雙桂鄉一岩洞石室，此時生活雖艱苦，但在鄉鄰親故的保護下，却有了一個較為安寧的環境，乃重新開始《周詩新詮》的寫作。然而既無稿紙，亦無桌案，身邊僅有少量書籍可資用，不少徵引之文只能靠記憶寫出。但他憑着堅韌的毅力和豐厚的學養，以石板為桌，練習簿作稿箋，在煤油燈下，孜孜不倦，用了兩年半時間，寫成全稿，共 70 多萬字。其間經過多次大的修改，前後稿本積高盈尺，達兩百多萬字。盡管他於此書用功堪比《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但亦知當時出版無望，許多觀點難獲主流認同，故曾作詩一首以舒其旨：

二十八月困書城，鉛槧奔馳苦自縈。
不因伏櫪忘千里，猶從覆瓿奮餘生。
百萬言書能奕出，一無是處可定評。
竭蹶非為名山業，徒以辛勤助筆耕。

1980 年代初，先父老友徐中舒、何洛等先生看過此書《二南》部分的稿子後，曾予以“可算從民俗上研究詩經的突破之作”的評價。並將其推薦於中華書局。中華書局審閱後，認為“頗有新意”，“有不少獨到見解”，建議壓縮篇幅，適當修改，以利出版。但其時先父年事已高，且因平反後亟待整理出版的舊作及學術活動甚多，無力再修訂此稿。遂暫時擱置。

1986 年，先父將書稿交付我整理。但因此稿涉獵學科甚廣，體例繁雜，尤其是有不少引據，當時是憑記憶寫的，需重新一一查找核對，工作量頗大。加之我調社科院後，組建康藏學科任務較重，因而整理工作時斷時續，進展緩慢。嗣後，又因出版經費未能解決而停頓。直到近兩年，得到四川省社科院、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和巴蜀全書編撰委員會的大力支持，被立項資助，才在助手與學生的協助下完成全書的整理工作，交付出版。

本書名為“新詮”，其“新”主要體現四個方面：一是在研究方法上，雖仍采取

傳統的章句解讀形式（是作者爲了與過去傳統經學著作相對照而特意如此），但却突破傳統的研究方法，運用了歷史地理學、民族學、民俗學、社會學、生物學、語言學與文獻學、訓詁學等多學科相結合，綜合、比較研究的方法，來解析、詮釋《詩經》；二是對詩三百篇的編次與歸類作了歷史考訂，提出新的編類；三是對各詩的歷史背景作了新的探索，並以此考證了各詩年代、作者與主旨；四是針對歷代解經進行臧否，對歧義進行辨證，對各詩的一些章句含義作了新的解讀。

例如：從歷史地理學角度，論證了“二南非國風”；從民俗文化學角度，以少數民族現存民俗爲實證，指出《關雎》既非歌“后妃之德”之作，亦非“表現青年男女求愛”之作，而是迎親時的贊禮歌；從語言學角度，提出“來、牟”是漢藏同源詞語，論證了麥是從西羌傳播於周原的觀點；還從號稱“世界生物基因庫”的橫斷山區孑遺古生物中，對“詩經”中一些動植物作出新的辨識等，可謂研究獨辟蹊徑，見解新穎獨到，具有獨特的學術價值。

全書分爲兩大部分，共5卷：第一部分爲導論，主要是論述《詩經》學形成與發展源流，對《詩經》產生的社會歷史背景解析，說明本書寫作緣起；第二部分是“新詮”正文，主要針對經學家的舊解，作新的詮釋，探求原旨，闡發新義。

我們對此書的整理工作，主要是：（1）梳理謄繕。將原稿中文字前後重複及筆誤之處，作調整、修訂。將原來夾叙於正文中的一些專論，提出來單獨成章，附於每篇的正文之後，以便閱讀。（如《二南非國風》，《大武六成考》等）（2）校訂補缺。全書徵引文獻典籍甚多，所據版本不同，我們一一進行校核比勘。對引文中不準確和缺漏字的地方，予以校正、補遺。並盡可能統一規範引文。對原稿中的筆誤和水漬浸殘之字，辨識補正。（3）添加注釋。原稿中有一些論述過於專業、簡略的地方，整理中我們少量補加了一些注釋（主要是涉及藏彝等民族的文化和經學的專詞、典故等部分）。（4）規範文本。原稿寫作於“文革”中，爲規避文字之禍，原稿中篇首有“語錄”，文中有一些當時流行的政治詞語。在整理中我們酌情作了規範處理。限於我們的水平，整理中難免有疏誤或不當之處，還祈閱者指正。

任新建

序

——兼論《詩》學源流

任何民族，各自都有其創造的音樂，和配合音樂歌唱的詩。這種詩，被稱為“樂詩”。相應地，這種樂，被稱為“詩樂”。

我國最早的“詩樂”，傳說是：“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帝德》，八曰《總禽獸之極》。”（見《呂氏春秋·古樂篇》）這“八闋”就是八章樂詩。但根據社會發展的規律推斷，那時候還不可能有這樣全面反映人類生活的詩章。比較可靠的當是《史記·樂書》所載“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和《尚書·虞書》中的韻言部分，俱可能是用我國原始社會末期樂詩保存下來的史料纂輯而成的。現在保存下的儒家學人所稱的《詩經》三百餘篇，是屬於殷周之際，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時期，各階層人民的樂詩。它是孔子從魯、周、鄭、衛諸國太師（掌樂之官）那裏鈔錄下來，用以教授他的弟子門人的教材。在鈔錄的過程中，經過了孔子的刪選（後人把孔子這番工作，叫作“刪詩”）。可見當時的樂詩是決不僅這區區三百零五篇之數的。

“《詩》學”這一概念以及“《詩》”這一名詞，是由孔子最先提出來的。在《論語》的《陽貨》《季氏》《為政》《子路》諸篇裏，他說：“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還對他的兒子孔鯉說：“不學詩，無以言。”又說：“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又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還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孔子的這些話，道出了《詩》在當時士大夫生活中的實用價值。這和他所處時代的社會風尚，是有密切關係的。

春秋時代，列國的公、卿和士大夫們在聚會、燕享時，要奏樂、賦詩，用斷章的詩句表達自己的意思；而對方也必須從這些詩句瞭解其意圖，而給以適當的答復。具有這種交際工具，又會靈活運用的人，就會得到尊敬；否則，就要遭到蔑視，甚至還

會受到嘲弄和侮慢。這方面的事例，《左傳》《國語》裏記載得很不少。那個時代，用人和選士也非常注重“《詩》學”，說什麼“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因之，那時候，許多人俱要向奏樂的“師”求教，拜他們作老師。各級學校也均由樂官們主教（說詳《禮記·王制》）。孔子教的是私學（類似現在的民辦學校），弟子們全是不能進入國立學校的平民子弟，要入仕，就非將這套本領學優不可。因而孔子要從列國太師那裏鈔錄、刪選一部分樂詩來教自己的門人弟子，並一再提示《詩》的這些實用價值和學《詩》的重要性。

這一時代裏，使用《詩》，多爲斷章取義，各取所需，對於《詩》的本事同它全篇的主題思想並不留意，更不深研《詩》的涵義及它的時代背景。這種《詩》學，被叫做“章句之學”。它祇須把樂章節奏分得清楚，而各句的辭義却是可以根據個人需要，隨意綴合的。孔子的《詩》學概念，便是這樣的。

進入戰國之世，寒士布衣憑藉才能一躍而至卿相的人，逐漸多了起來。這些人大都不曾學過詩。統治階級的生活中，“詩樂”的作用也逐漸由衰而減了。于是，儒家者流的《詩》學，也跟着喪失了市場。祇有孔子的門人弟子同孟軻、荀卿等少數人，仍傳習之；而且學習的重點也變更了。孟軻講的是“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孟子·萬章上》）這種說法，是就詩論詩，已經打破斷章取義的陳套了。荀卿在《儒效》中說：“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天下之道畢是矣。鄉是者昌，信是者亡。”他是將《詩》與五經共同作爲儒家的教材來看待的。

儒家的經典書籍，遭秦火後，《詩》由于是韻言的歌詞，容易從口頭保存而遺留于民間。至漢文、景之世，復有齊·轅園生，魯·申培公，燕·韓嬰，趙·毛公四家寫本的出現。此四家上距焚書之厄，不足百年，所傳寫本俱授自荀卿的弟子，雖有異同，大體是一致的。它們都具有荀子說《詩》的特點，認爲《詩》是傳“道管”的經典。《詩經》^[1] 這一名稱，便是在西漢時期產生的。

《詩》被尊爲經典，崇爲“道管”，對於詩語的解釋，自然也就有了變化；于是產生了漢儒的《詩》學概念。

漢儒的《詩》學概念爲何？《毛詩·大序》是這樣說的：“《關雎》，后妃之德也。

【1】“詩經”二字，始見于《漢書·藝文志》。《藝文志》係以劉向《七略》爲藍本寫成的。《七略》所列“詩六家四百一十六卷”中，首行是“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可知劉向時已有“詩經”這一名稱。且由“魯、齊、韓三家”注語，可知劉向時，《毛詩》尚未得列于學官。《齊詩》亡于漢末，即馬融、鄭玄、盧植等提倡《毛詩》之際。《魯詩》亡于晉代，即鄭玄《詩箋》流行之際。《韓詩》亡于唐代，即孔穎達《詩正義》流行之後。唐以後，毛詩專行。

（此句爲《毛序》文，下爲衛宏所續之文。）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爲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這篇文章，是漢以下兩千多年中，儒家者流奉爲經典。誰訾議它，便會被斥爲“離經叛道”。

齊、魯、韓、毛四家，以毛詩最後出。毛詩初僅流行于河間及九江等郡國地區。新莽時，九江人陳俠爲講學大夫，始將它帶進朝廷，然尚未得列于學官。後漢初始置毛詩博士。從此，人皆習毛詩，而三家之詩漸爲儒士所棄，直至清末廢科舉。從公元一世紀始至十九世紀末，毛詩流行了整整一千九百個年頭。

毛詩能壓倒三家的原因：一是僞託它的《詩序》撰自孔子的弟子子夏，對儒家者流具有很大的號召力。二是它的《詩傳》出三家之後，能兼取三家說詩之長以自厚。三是它的大小《序》中明顯結合史事的多達三十五篇；探索作者時代背景的更屬不少，甚合儒生的脾味。第四，尤爲重要的是，它能適應統治階級的需要，把許多批判揭露封建統治者罪惡和醜態的詩，都歪曲解說爲文王及其后妃德化所成的美俗，充其極，亦祇是對個別統治者的“怨悱而不怒”的諷刺之作。這樣的宣傳教化，當然會得到封建統治階級的寵愛。由是它還得到諸如衛宏、鄭玄和孔穎達這些功臣們的啓微闡幽，發揚光大。

衛宏（事跡詳《後漢書·儒林傳》），光武時議郎，九江人謝曼卿的弟子，依據師說，在《毛詩序》文下，續上許多文字，與《序》皆僞託子夏所撰，遂使毛詩大行。

鄭玄（《後漢書》有傳），原治韓詩，兼通六經。後從馬融治毛詩，作《毛詩箋》，深闡毛氏之說，複注群經，互通其義旨，成爲累代封建王朝崇奉之書，歷來讀書仕進之士莫不遵習之。

孔穎達（舊、新《唐書》有傳），貞觀十六年，奉太宗敕，撰《毛詩正義》，溝通毛、鄭，更恢宏其義旨。後復撰《十三經注疏》，于《詩》亦全遵鄭玄之說。經文中，夾用《毛傳》《鄭箋》及陸德明《毛詩音釋》，並以所撰之《正義》爲《毛詩疏》；又將“大、小序”隨篇題移冠篇首，標以大字，比于經文，是爲唐代《詩經》